

石射退出。这场假戏做完后，多门及其幕僚二次出来，多门换了一幅笑脸嘻嘻哈哈地伸出手来同熙洽握手，并请熙洽坐下，亲切地谈起了他们在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往事，畅叙师生旧谊，同时摆上了酒菜招待起熙洽来。在饮酒时，熙洽向多门谈了他卖国的具体设想。

熙洽不仅在政治上阴险狡猾，在生活上也是个贪婪淫残，寡廉鲜耻的酒色之徒。他曾与儿子同嫖一娼，以致父子俩为此冲突而不可开交，这件丑闻在当时简直成了头条新闻传遍吉林。至于同当时最活跃的人物，教育厅长荣孟枚两个携带大小妓女，招摇过市，更是司空见惯。他还仰仗势力，令各县长、各税捐局长，派捐摊款，修筑吉林俱乐部，其规模之大，在省城所有娱乐场中居首。俱乐部内每天莺歌燕舞，彻夜狂欢，成了熙洽的淫乐之窟。

这些秽闻丑事都是伪满建国以前或建国初期的事。后来他就任宫内府大臣，就不能无拘无束了。帝宫对“康德皇帝”溥仪来说是个囚笼，对他这位宫内府大臣来说，恐怕也是一条搁了浅的船。溥仪身边还有关东军派来的吉冈安直进行看守，熙洽和大部分汉奸大臣，从1940年开始，也都罩在首都警察厅布下的秘密特务罗网之内。

（摘自《伪皇宫陈列馆年鉴》，1985年）

臧式毅的一生

王文铸

臧式毅的一生，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九·一八”事

变前，他由一个留日士官生成为奉系军阀中著名的人物，担任了辽宁省政府主席；“九·一八”事变时，他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下，充任伪奉天省省长；第三个时期则是臧作为伪满民政部大臣、伪参议府议长时，效忠侵略者、助纣为虐，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的殖民统治工具，民族的罪人。

—

臧式毅，字奉久，1885年12月29日生于沈阳城南三道岗子村。1892年，开始读私塾，由于家境不佳，从1899年起又半耕半读念了二年书，后在家务农，农闲时读书，其求学精神得到他伯父的赏识，在伯父的资助下，臧于1904年又来到铁岭县银冈书院读书。

此时，清王朝摇摇欲坠，为了挽救灭亡的危机，实行新政，创办新式的陆军学校。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公开向社会招生，臧于1905年秋考入该校。1907年考入日本陆军东京振武学校，后转入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

1911年辛亥革命后，臧回国，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担任了7年教官。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奉系张作霖已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臧凭他自己的才干和学识，加之他留日士官生的资格，已经开始接近奉系势力的核心。1919年，他投靠黑龙江督军孙烈臣的门下任督军署上校参谋兼国防筹办处参谋长和军官养成所教育长。臧的工作干净利落，颇得孙烈臣的信任。1921年，孙烈臣转任吉林督军，臧又随之，兼任军署卫队团团长，并负责吉林省城和督军署防卫。孙烈臣对臧式毅“信任至厚……如影形随，始终进退。”当年，苏联红军围剿帝俄白匪，白匪窜扰我东北内蒙地区，孙烈臣乃遣劲旅驱逐白俄匪军出国境。臧随军前往，因累建功勋，军阶升至督军署少将参谋长，成为孙烈臣

的得力助手。

张作霖为争夺地盘，以便穷兵黩武“问鼎中原”，对吉、黑两省进行整饬，臧协助孙烈臣治理省务，颇有建树，所以在孙烈臣生病时，臧受命管理督军署事务，对于政务、军务、军械、粮饷，他都处理得井然有序，逐渐得到了张作霖的器重。

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大败而归，他看到了“绿林”式的旧派军队战斗力太差，发誓要彻底改革奉军，重用有才干的新派将领，大力提拔在日本和国内高等军事院校出身的军官加以重用，整顿奉军。1924年6月，臧式毅奉调担任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参谋长（原参谋长张学良升任整理处副监），陆军整理处以改革军队和军事学校的教育训练为主要职责，撤换不称职的将领和各级官佐，录用军校出身的新人，编发军事杂志和讲义，增长官兵的见闻，他这种新式的整军方法得到了张学良的好评：“奉久办事，一板一眼的，有条不紊，作风踏实，让人放心。”

臧在陆军整理处于奉系军政要人接触增多，当时奉军分为新、旧两派，“新派人物是杨宇霆起的头……他先后吸收了韩麟春、郭松龄、臧式毅等成了新派的骨干。后来张学良又以少帅的身分列入新派的首脑。”臧于杨宇霆的交往与日俱增，关系非常密切。

不久，臧调任镇威上将军公署参谋长。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杨宇霆带兵入关，臧留守奉天，担任省城戒严司令，执掌后方的军政大权，维持社会秩序。臧统辖少数军队和省政府所辖的警卫团队，竭力维持全省治安，使奉军在前方混战免除了后顾之忧。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胜，奉系军阀势力一度达到苏、皖两省。张作霖论功行赏，杨宇霆就任江苏督办，杨指名要臧同赴江苏管理军务、政务，臧前往南京充任江苏军务善后事宜督

办公署参谋长。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奉军所到之处，横行不法，扰害人民，镇压反帝运动，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恨。也引起其它军阀的不满，掀起了反奉运动。浙江督办孙传芳趁机拿下淞沪，进军南京，奉军三面被围，仓促撤退，臧式毅在下关冒死送杨宇霆过江后，被江苏军阀陈调元所俘，监禁半年才获释返回沈阳。担任了奉天镇威上将军公署参议、留守司令，俨然成为镇守一方之大员。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发生，张作霖被炸身亡。此时奉军主力仍在关内，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之事，臧式毅等人制定了秘不发丧的策略。以奉天省政府公署的名义发表通电称：张作霖仅仅受点轻伤，精神很好，要求各界各安生业，维持秩序。臧在大帅府对参与其事的几个近人说：“眼下只有这一着，要内紧外松。外与日本人周旋，内派心腹去北京报告军团长（指张学良），从速返奉商量后事。”

由于臧式毅等人采取了慎重的处理对策，使日本侵略者无隙可乘，特别是由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没有作好战争准备，所以延缓了日本侵占东北的阴谋。臧式毅等人的“秘不发丧”方针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缓和了当时的紧张局面，很受张学良的赏识，委派臧式毅处理对日事务，并任命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少将参议。

南京撤退时，臧舍身护送杨宇霆，更加得到杨的依重和信任。杨宇霆当时还兼任东三省兵工厂督办，1927年夏，杨宇霆特意让臧式毅兼任东三省兵工厂总办，具体掌握兵工厂的事务。

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常荫槐二人被处决后，臧怕因此遭到株连。张学良特意对他安抚了一番，讲清了事件的部分原因，并让臧负责处理事件的善后，不但命他接替了杨宇霆生前的官职，担任了东三省兵工厂中将督办，还提拔他为保安总

司令部中将参谋长。

1930年，臧式毅就任辽宁省政府主席，他除了参与张学良的军政大计之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民政和财政方面。连年不断军阀混战的消耗，使财政已到了枯竭的边缘。臧就职后，首先进行了金融整顿。他说：“治理东北若不从财政金融入手，经济难以振兴。”成立了东北金融财政整理委员会，提出了一些补救的办法。

二

自张学良就任国民党中央政府陆海空副总司令，东北军主力入关，坐镇北平，东三省一时形成空虚状态。“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沈阳城内的军政首脑仅有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和作为辽宁省政府主席的臧式毅。日军攻击北大营的炮声响后，臧当即打电话给荣臻，请其速来商量对策，并通知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等人到臧的公馆。慌乱之中，收到了南京军委会十万火急电报：“顷准日本公使馆照会，内开，陆军省奉明天皇，准予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内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防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会，切切此令。军事委员会筱。”这封电报如同一颗定心丸，使他们心情稳定了，认为没事了，臧式毅说：“快到拂晓了，他们的‘演习’也要结束了。”

9月19日早5点多钟，日军占领北大营后进入城内，臧式毅方如梦初醒，想到了“日军已进城，就不是什么演习了，我们派人向日军作交涉。”遂派秘书长赵鹏筹等去省团、长官公署向日军交涉，并派东北司令长官公署副官处长李济川，省署教育会长姬金声速赴北平向少帅张学良报告。有人劝臧一起离开，但臧表示：“我是省长，是一省之父母官，在这种时候不能走。”

此时臧公馆所在的工部衙门胡同口，日军对臧式毅进行了

严密的监视。由于臧的声望和资格，日军想利用他，但是谈判没有成功，日军恼羞成怒，于9月19日，日本宪兵队长三谷清率领宪兵将臧公馆包围，大肆搜查，随后将臧式毅抓走，软禁在沈阳大西关五纬路鲍子仪住宅达3个多月。

这期间，在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策划下，成立了以袁金铠为委员长的“奉天地方维持会”（即辽宁省维持委员会），暂代行省政府的职能。袁金铠虽然甘当傀儡，但他仅是吟诗作赋有余，政令不行，效命不力，做不出关东军所满意的“政绩”，因而决定利用被软禁的臧式毅，出任伪省长。企图靠臧的“威望”以便恢复旧日的行政系统，诱迫各县归顺，妄想收取统治全省的效果。于是在关东军指使下，汉奸赵欣伯进行了秘密的活动，对臧进行劝降。

1931年12月上旬，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驹井德三，来到软禁臧的鲍氏住宅，对臧威逼利诱。臧贪生怕死，不惜出卖祖国人民的利益，同意了板垣所谈密约的全部条件。其大致内容是：

1. 参加东三省“新的政权”组织，充任官吏；
2. 日本军队驻在东三省境内；
3. 东北的国防由日军负责；
4. 东三省负责日本驻军军费的一部分；
5. 东三省境内的铁路全部由日本经营。

在这张出卖我国东北主权，投敌卖国的契约上他写上了“今日之谈话我完全同意”之句后，就送回了臧的公馆。

12月15日下午，伪奉天市市长赵欣伯率武装警察200余名突然命令沈阳市商会开会，强迫出席人员全部签字，“推荐”臧式毅为省长。然后又列队来到省署，将事先准备好的呈文递交袁金铠手中，请其辞职和解散“维持会。”

12月16日下午，臧随同赵欣伯拜访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后，来到伪省署，在日本人的监视下，召集全署各厅、科长以上人员开会，宣布就任“奉天省省长”。并在关东军的授意下，任命原“维持会”顾问金井章次为伪省政府首席顾问兼交通委员会顾问；中野琥逸为伪奉天市首席顾问；以及各厅的日本顾问。省政府的实权，完全操纵在日本顾问手里。

臧甘心投敌，事事被人操纵，从他被释放之日起，即有日本宪兵军曹横山政雄长期跟随“保护”，时刻不离左右，连起居动作也受到监视。该军曹出则同车，入则住在臧宅，任意出入臧的卧室，凡有客来访须先告知，得其同意后方能传达会见。每次会客，则入客厅坐听监视，横山政雄监视臧式毅一直到1934年他专任伪民政部大臣时方撤去。

尽管如此，臧式毅仍是死心塌地竭尽全力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辽宁全省效命。当时，辽宁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还没有向日军投降，正处于观望之中。臧派伪财政厅厅长赵鹏第前去劝降，并保证不变动于芷山的部队，保证他的个人安全等。有臧的担保和引诱，于芷山马上就率其所辖部队投降了日军。但该部驻防恒仁的第一团团长唐秉伍，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自任司令，誓师抗日，影响辽东十数县，于芷山率伪军几次进攻皆大败。于是臧式毅面请板垣征四郎派日军前往“讨伐”，并下令各县做好对日军的物质供应，在兵力优势的日伪军联合进攻下，自卫军部队被各个击败。

1931年9月底，米春霖奉张学良之命由北平到锦州，代理了臧的省政府主席，并在锦州正式成立辽宁省政府，调集二个旅的兵力集中在锦州附近。臧秉承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旨意，以他个人的名义写信给张学良，并派伪省政府咨议徐绍卿持信在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的陪同下送给张学良。信的内容大致

是：日本就要占领锦州、绥中一带，应将各该地东北军及军民机关一律撤入关内，免致发生战争。紧接着臧又按照关东军的策划，以伪奉天省政府的名义，把在辽西的东北军和义勇军诬称为“土匪”，请求关东军讨伐“辽西兵匪”，这样，日本侵略军攻占了锦州，完成了对辽宁全省的占领。

1932年初，日本为制造伪满洲国而加紧进行阴谋活动。

前日本陆相南次郎辞职后，奉日本政府之命以军事参议官的身分于1931年底来到沈阳，就筹建伪政权之事和臧会谈。南次郎首先讲了日本政府所拟定的二个方案，让臧选择。其一是：用张作相在东北建立特殊的政权，统一新局面；其二是：脱离国民党南京政府，迎接溥仪来东北，建立满蒙独立国。臧没有表明意见，只说他本人决心和熙洽合作，一切以吉林的主张为主张，二个方案听从吉林选择，他坚决和吉林合作，采取一致行动。

熙洽选择了第二个方案，认为溥仪是清清皇帝，东北原本是清朝的发祥地，溥仪来最合适。熙洽的意见也就代表了臧式毅，投敌卖国，甘心充当汉奸，他们是一丘之貉。

日本关东军加快了建立伪政权的步伐，臧一面跟着摇旗呐喊，一面做好召开筹建伪政权会议的一切准备。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在板垣的安排下，于1932年2月14日找臧通告了召开“建国会议”的几点主要措施：1. 2月16日，张景惠、熙洽、马占山、臧等“四巨头”拜访关东军司令官；2. 2月18日发表“独立宣言”；3. 推举马占山就任黑龙江省长；4. 政务委员会的成立由会议决定等等。臧当即表示，坚决照此办理。

1932年2月16日，在伪奉天省公署由板垣征四郎主持召开“建国会议”，即所谓的“四巨头会议”，并发表了脱离南京政府的“独立宣言”。臧作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六名委员之一，

在“建国会议”上对关东军拟定的伪满建国计划、伪满的政体、国体极表赞同，并积极配合日本抓紧拼凑伪政权的活动。因此，得到日方的大为赞赏，并称臧是“谱写满洲国史第一页的栋梁人才”、“杰出的政治家”。

三

1932年3月8日，溥仪由汤岗子乘车去长春，臧在沈阳上车，拜见了溥仪（这是臧第一次见到溥仪），并护送溥仪同车来到长春。

3月9日，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代表满洲民众献上了用黄绫包裹着的‘执政印’”。

3月10日，溥仪正式公布了伪政府成员名单，任命臧式毅为伪民政部总长兼伪奉天省省长。

臧作为汉奸亲日派，对日本主子唯命是从，民政总长之位形同虚设，实权掌握在总务司长竹内德亥、警务司长甘粕正彦的手里。臧对他们的用场是：点头称是，举手赞成。但臧仍不甘寂寞，尽心尽力效犬马之劳，“每周去新京掌管民政部事务，又掌管奉天事务，他每天忙于繁杂的政务之中，毫无闲暇……可见臧为王道乐土满洲国的建立而竭力奔忙。”在他的积极配合和参与下，1932年7月，伪民政部公布了县的“官制”，在县长下设日本人的参事官（后改为副县长）。为了全面控制县一级的各方面大权，还陆续配备了由日本人担任的警务指导官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臧以伪民政部的名义陆续将东北各县的日本参事官和指导官全部派齐。使得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渗透到全东北的各个角落，强化了各地的政治、经济、警察“统制”，推行了日本的殖民地政策，使东北人民处于被奴役、被压迫、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

1932年4月21日，李顿调查团来到沈阳，向臧式毅进行调查。臧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称伪满洲国是所谓王道乐土的独立国家。

日本为了使伪满政权更加傀儡化，为了更便于统治这块殖民地，关东军又导演了实施帝制这幕闹剧。1933年为此成立了筹备委员会，臧任地方部长，主要负责警备工作。他首先由各省调来1000余名警察，在“新京”四周十里设立了两道警卫线，严格检查来往行人。

1934年3月1日，溥仪登极后，任命臧式毅为伪民政部大臣（伪奉天省省长由葆康接任）。

1934年12月22日，臧式毅到日本拜见了日本天皇裕仁，参拜了奈良神宫、伊势神宫、明治陵墓。到处发表演讲，肉麻地吹捧日本的侵略政策。他说：“十分感谢贵国帮助建立满洲国，请求进一步援助，愿为日满亲善共同努力。”

臧返回“新京”后，日本关东军对臧在日本所表演的这幕谄媚剧甚表满意。于1935年5月21日提升他为伪满洲国官吏名义上的最高职位参议府议长。在此期间，按照日本侵略者的意图，经臧签署的镇压人民反抗、法西斯统治、资源掠夺的法令、法规、文件不下千件。他对关东军的各种指令是言听计从、奴颜婢膝、尽心尽力，所以他的伪参议府议长的高位保持了十年之久。

1941年10月28日，臧式毅作为伪满全权代表飞往南京。他在南京伪国民党政府大礼堂和汪精卫、日本驻南京伪国民政府大使阿部信正式签订了《日满华三国共同宣言》。这个宣言加强了日本统治下傀儡政权之间的勾结，助长了日本侵略者分割中国领土的野心。

1945年8月11日夜，臧等陪同傀儡皇帝溥仪如丧家之犬逃

到了通化大栗子沟。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拿出“退位诏书”，臧和张景惠、熙洽等一起面请溥仪退位，演完了伪满洲国最后这场戏。8月18日，臧返回长春，他和张景惠等伪大臣一起“宣布成立‘治安维持会’准备迎接蒋介石的军队接收。”8月30日，苏军逮捕了臧等伪大臣，押往苏联，1950年7月31日引渡回国。1956年11月13日，臧式毅病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摘自《伪皇宫陈列馆年鉴》1986年。）

张海鹏充当日军侵略黑、热的马前卒

赵万福

一、1931年张海鹏投降日敌的经过

原东北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出身绿林，性情粗暴，刚愎自用。在“九·一八”事变当时，我正在他的部下当医务处长，也与他一同投降了日敌。谨将当时经过的一切实况，回忆叙述如下：

当事变发生之初，张海鹏曾打算将他原有的四个骑兵团，化整为零，在洮昂铁路沿线，抗拒日军的北犯。但他仅为个人利益打算，而并无抗敌决心，正在举棋未定之时，忽接到东北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代电和张学良由北京的来电，均示以避免冲突，放弃抵抗。于是张海鹏乘机以民意为名，自封为蒙边督办，把原镇守使署改为蒙边督办公署。

张海鹏与驻洮南满铁公所（实际就是日本领事馆）所长河野正直，平素往来很好。“九·一八”事变后，接到河野的通知